

之力倡改革開放，亦聲言要以推行「中國國民性改造」為起點。^⑫各式各樣的，論旨與「新民」一致，但策略有別，重點不一，態度激進、緩和亦大相逕庭的言論及行動，在國史上的淵遠流長與影響，應有進一步挖掘探究的空間。

作者曾表示，此後將對梁啟超思想與在他之前的思想論域進行比較，以及，為對梁啟超在當時的思想光譜有更全面的認識，亦將以《新民說》之後的一些思想課題進行更具體的探討（頁39-40）。以作者在本書所展現的處理問題的治學功力，當是令人可以期待的。而本文以比較長的篇幅對本書論證所做的整理，以及嘗試提出的可進一步討論的課題，只是對關心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的學界同好閱讀本書與據之進一步反思的野人獻曝。

□臺大歷史所博士班研究生·潘光哲□

《明實錄類纂》李國祥、楊昶主編，武漢出版社，1990年。

《明實錄》做為明代史研究的基本史料，歷來為學者所珍視，然由於卷帙多達三〇四五卷，使用起來亦實有其不便。自民國初年孟森先生編纂《明元清系通紀》（北京大學，1934年），及抗戰前日人編纂《明代滿蒙史料·明實錄抄》（京都大學文學部，1943-1959年）以來，以專題方式編纂《明實錄》資料，成為一種常見的型態。其後如香港方面羅香林及其門人趙令揚等所編《明實錄中之東南亞史料》（香港，學津書店，1968年）、《明清實錄中之西藏史料》（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81年），何丙郁等輯錄的《明實錄中之天文資料》（香港大學中文系，1992年）；臺灣地區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所編《明實錄閩海關係史料》（臺北：臺灣銀行，1971年）、鄭樸生先生編次的《明代倭寇史料》一、二輯（臺北：

⑫ 溫元凱、倪端，《中國國民性改造》（香港，曙光圖書公司，1988年）；參見：曾慧燕，〈我沒有被吹倒：改革家溫元凱〉，（香港）《九十年代》，總208期（1987年5月，頁23-25）。關於溫元凱等人在1980年代中國大陸思想界之地位的報導，參見：傅偉勳，〈「走向未來」的金觀濤與劉青峰：大陸學術界的前衛象徵〉，收入：氏著，《文化中國與中國文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77年），頁229。

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日本方面有《明代西域史料·明實錄抄》（東京：京都大學文學部內陸アジア研究所，1974年）、《中國、朝鮮の史籍における日本史料集成·明實錄之部》（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年）、《明代西南民族史料·明實錄抄》（東京：東洋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文化研究所，1983年）等。而就編纂的數量來說，則以大陸方面最多。就個人所知，如《明實錄蒙古史料抄》（北京：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蒙古研究室，1957年）、《明實錄有關雲南歷史資料摘抄》（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明實錄貴州資料輯錄》（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明實錄藏族史料》（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明實錄廣東少數民族資料摘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明實錄經濟資料選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明實錄廣西史料摘錄》（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明實錄東北史資料輯》（瀋陽：遼瀋書社，1990年）、《明實錄鄰國朝鮮篇資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出版時間不詳），均為相同類型的資料集。而在以上的十餘種資料輯錄中，主要以摘編明代邊疆地帶的資料為多。

除此之外，也有學者以在位皇帝所在的實錄為斷限，編製索引。徐泓先生所編的《明太祖、太宗、仁宗、宣宗實錄分類索引》（哈佛燕京學社補助研究報告，1983年），與《明孝宗、武宗實錄分類索引》（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報告，1988年），即為此一方面重要的資料索引。

晚近，由李國祥、楊昶主編的《明實錄類纂》，無疑是有關《明實錄》資料輯錄的一大盛事，截至目前為止，先後已有《人物傳記卷》（1990年）、《廣西史料卷》（1990年）、《湖北史料卷》（1991年）、《涉外史料卷》（1991年）、《北京史料卷》（1992年）、《宮廷史料卷》（1992年）、《文教科卷》（1992年）、《四川史料卷》（1993年）、《自然災異卷》（1993年）、《經濟史料卷》（1993年）、《廣東海南卷》（1993年）、《福建臺灣卷》（1993年）、《軍事史料卷》（1993年）等十餘種出版。其中除《廣西史料卷》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外，其餘均由武漢出版社梓行。對於明代史事的研究而言，這一套書的出版，在某程度來說，提供了學者相當的助益。但《明實錄類纂》隨著各卷的逐

一出版，其編纂所呈現的問題也逐一浮現。在使用上，其不便之處也極為明顯。下面就以一個使用者的角度，指出這一套書的重大問題。

一、體例不清。《明實錄類纂》已出版各卷的分類，兼有以地域為主及以資料性質為別的兩種分類，前者如廣西、湖北、北京、四川、廣東海南、福建臺灣各卷；後者則已有人物傳記、涉外、宮廷、文教科科技、自然災異、經濟、軍事諸卷。此二大類兼而並存，就使用者多元需求的立場來說，有其必要。不過，在此一套書中，並未就資料重疊的處理態度做說明，以讓使用者明瞭如何就其個人需要加以翻查。如已有《自然災異卷》，在地域類各卷中也有〈天地災異〉；已有〈涉外史料卷〉，在地域各卷中又有〈涉外關係〉；其他在地域各卷中的〈人物〉、〈文教〉（〈文化〉）、〈經濟〉，與《人物傳記卷》、《文教科科技卷》、《經濟史料卷》，都有所交疊，但這兩大類重覆的情況未見各卷中的凡例有所說明，交代資料的處理方式。實際上，這一套書的總凡例並未給予使用者一個充分的訊息，以明瞭整套書的編纂分類、綱目意涵及資料的處理態度；且各卷也沒有個別的凡例說明其資料的歸類方式，或個別特殊綱目的定立意義、該綱目項下所收資料的內容、種類為何，整個編纂的體例並不清楚，似乎意謂使用者已然應該知道其中的類別歸類所在，不需要再加說明。

二、收錄未全。《明實錄類纂》做為史料的類編，還存在著一個嚴重的問題，即史料遺漏極多，而編者並未提示使用者。基本上，《明實錄類纂》僅是摘抄，並非全錄。且所摘標準為何，也不清楚，有極重要而未摘，無關大體者反而錄進。茲撮舉數例為證：

1.明代北京的經濟活動，特別是工商業，在萬曆年間有重大變化，而《北京史料卷》〈農牧工商〉項下，萬曆朝全然未錄。

2.有關明代北京修築外城一事，在明憲宗時已有定西侯蔣琬提出（《明憲宗實錄》卷一五六「成化十二年八月庚辰」條），《北京史料卷》〈工程交通〉未收。至明世宗嘉靖年間修築外城時，亦有一番討論，其事自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兵部尚書丁汝夔提出，至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工程完成，經歷興工、停工、復工、完工以及大臣言論表達、勘察等的過程，但在〈工程交通〉中所錄多不完整，其中重要的數條，如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甲子定議修築外城事宜、嘉靖三十二年三月丙午兵科給事中朱伯辰、通政使

趙文華、大學士嚴嵩申請復工、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丙辰兵部等衙門會勘地形、嘉靖三十二年四月丙戌明世宗與嚴嵩討論修築工程等，未見摘錄；所收僅較不重要的數條，且有自加截去文字情況，如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甲申條省去督工名單、嘉靖三十年二月庚辰條省去城中居民宋良輔等願出資助築及陸炳以為不妥的文字、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乙丑條省去告太廟祭文。

3.有關京城治安的資料蒐集也多不全，如永樂二年二月壬午設北京兵馬指揮司、永樂七年八月乙巳增設北京五城兵馬司、以及往後加設巡捕營（弘治十五年）、擴增巡捕營步騎兵員額（武宗、世宗朝）等，《北京史料卷》〈監察司法〉，抄錄多有遺漏。又明末北京城中把桿結幫，相互械鬥的資料，如萬曆四十六年閏四月丁卯，泰昌元年八月丙午、泰昌元年八月己未、泰昌元年八月庚申等也未收錄。

4.明世宗嘉靖初年的大禮議，是政治上的重要事件，前後爭論、相互執議的資料不少，而《宮廷史料卷》〈皇帝皇族〉項下，僅收錄嘉靖三年九月始定大禮的兩條資料，前此整個風波的過程之資料未見摘入。

5.明代風俗變遷與官方禁約奢侈僭越的資料，在《明實錄》中至少有百餘條，《文教科卷》〈風尚道德〉所收僅有數條。

6.自宮求職做為明代宦官史的特殊現象，在實錄中存在不少禁止自宮、驅趕淨身人的資料，以個人所知即有九十餘條，但《宮廷史料卷》〈太監宮女〉所收不及其四分之一。

7.另外，疫病資料亦然，其中如天順元年五月丙子條載順天等府，薊州、遵化等州縣，自景泰七年冬至是年春夏，瘟疫大作；嘉靖二十一年五月北京疫癘流行、嘉靖二十四年正月民多疾疫、萬曆十年春夏順天府疫癘盛行，人死甚眾等等，在《自然災異卷》〈飢饉疫癘〉、《北京史料卷》〈天地災異〉均未摘錄。

8.明代天文資料，依何丙郁先生所輯，達上下冊數百頁，而《文教科卷》〈自然觀測與科技〉所錄，顯然相差甚多。

以上，僅就個人所熟悉的部份撮舉，其他類纂可能也有相同遺漏情況，使用者未可認為全錄。總之，此一套類纂，僅能稱得上是摘抄或選編，而其所以致此，可能是摘錄人員在抄錄過程中不夠專注用心，編輯者又未細

心地校閱，乃使得原來意圖編纂完整性分類資料匯編的用心功虧一簣。

三、個別類纂分卷過大，如《文教科卷》應可再細分為文教、科技二卷，《經濟史料卷》應可再區別為工商、農牧漁礦、田土賦役等卷，如此一來，或許更利於使用。此外，在綱目的處理訂定上，有些卷的綱目也嫌過大，甚至僅有綱而無子目，如《文教科卷》只粗分〈思想學術〉、〈教育科學〉、〈文學藝術〉、〈自然觀測與科技〉、〈典籍著述〉、〈禮儀制度〉、〈宗教迷信〉、〈風尚道德〉及〈其他〉九大項，此外未再分細目。對於使用者而言，如此粗疏的歸類，實在有其不便利。因為在各項下的資料彼此相雜，使用時必須再花費時間自行甄別、挑揀，倘若在編輯時能因勢利導，就便加些功夫，將項下資料進一步細分，則缺憾非僅不存在，對使用的人來說更不啻是一貢獻，而乃未盡其功，落得只是有待研究者自行篩揀的「半成品」。這一情形，除《人物傳記卷》、《涉外史料卷》、《經濟史料卷》、《自然災異卷》外，或多或少都存於其他各卷中。

在這套書中，除了《人物傳記卷》因資料特性，按個別人物辭世時間的先後，以繫年方式收錄外，排除了以往大部份實錄資料選編不加分類、不立綱目的處理方式，各卷均有綱目，是一個進步。但個別卷中的綱目似乎有太過一致的缺點，尤其是地域性質的各卷，除《福建臺灣卷》外，俱分〈自然〉、〈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文教）〉、〈人物〉六大類，細目也大同小異；《福建臺灣卷》依其特殊地域情況，立有〈海禁海防〉一類，分有倭寇、海寇、海禁、海防四個子目，顯然較有同樣情況的《廣東海南卷》將此類資料置於〈軍事〉「軍事行動」、「鎮壓和剿討」二項下要好。另外，做為明帝國首都的北京，在《北京史料卷》的綱目下，全然看不出其與地方有何差異，倘若能在此卷中有「宮城建設」、「京城防衛」、「京官生活」、「舖戶供應」、「京畿莊田」……等能反映北京特殊性的綱目，則將予人不同的感受。質言之，如能依據各地域的個別情況，在可能的範圍內標立反映該區域的綱目，對於研究者而言，幫助必然更大；若定要以一致的標題統攝各卷，似乎不見得好。

四、資料歸類有誤，或同類史料分屬不同類別的情況，為數頗多。在綱目已然不夠細密的現實下，這一問題對使用者而言，更是一大困擾。就同類資料分屬不同類別而言，如《宮廷史料卷》、在〈衣食器用〉項下收有

成化十八年至二十二年間明憲宗賜百官扇子，以及萬曆十六年至四十八年間明神宗賜輔臣、講官吊屏、神箋、鮮筍、鱗魚、果品、珍饈、金銀等的史料；卻在〈其他〉項下，又見有萬曆二年至天啓七年間皇帝賜臣下字畫、果品等的同類資料，而在《經濟史料卷》〈物質生活概況〉項下，也收有萬曆年間神宗賜張居正酒膳等物的史料，其錯雜與疏忽，明顯存在，令人不解。又如有關於壇廟、山川祭祀的資料，分置於《宮廷史料卷》〈祭祀雜占〉，與《文教科技卷》〈禮儀制度〉中，也予人不便。

就歸類錯誤而言，如《宮廷史料卷》的〈衣食器用〉項下收錄了為數不少有關宗廟祭器、祭服、祭禮、喪儀等應入〈祭祀雜占〉；及賜太監鹽引、賜親王火者（小宦官）等應入〈太監宮女〉的資料。另外，又如《文教科技卷》〈風尚道德〉項下，也收有應置於〈太監宮女〉之下的自宮求職的史料。《北京史料卷》〈工程交通〉中，也收了不少創建佛寺的資料；在〈文教·科學學校〉下，如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壬午，申明靴禁... 其北平地寒，人民許穿牛皮直縫靴；成化十九年八月辛未、二十年二月辛未遣順天府官祭宋丞相文天祥等，放置亦有失當。〈文教·禮儀風俗〉所收，更多為官方祭祀活動如祭先農之神、宋丞相文天祥、祈雨、祈雪等，似與標題亦有差距。〈文教·其他〉所收則絕大部份為與佛道等有關的資料，似應標以「宗教信仰」之目。而《文教科技卷》〈自然觀測與科技〉一開始所錄資料，竟多是元明之際爭戰的材料。凡此種種，似可以看出資料的編輯過程，缺乏仔細的推敲，與審慎的態度。而似此歸類不當的情況，在許多卷裡或多或少均存在，編纂校閱不夠周延，於此亦可見了。

五、個別類卷的資料未應用校勘記補正。在諸多類纂中，如《經濟史料卷》、《廣東海南卷》等，可以看出其已用校勘記補正實錄抄錄的錯誤，但仍有不少未充分校勘的例子，如弘治四年八月戊午條「兩廣鎮守總兵安遠侯既為都御史秦紘劾」以下，依校勘記有「取回京，奏乞免就獄，待會勘訖聞奏」十四字，而《廣西史料卷》〈司法監察〉收錄時未依此補入。又如嘉靖二年五月庚辰條，致仕南京工部尚書黃珂卒，依校勘記有傳文述其生平，而《人物傳記卷》可能因未參閱校勘記以致未收錄此一傳記。這樣的例子可能也存在於其他類纂中。

六、標點錯誤、錯字頗多，但相較於以上的缺點，這一個問題已屬細

事，也就不多舉了。

編纂史料彙編是造福事業，也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對於《明實錄類纂》的編輯者，個人亦實有誠摯敬意。而對於此一套類纂的出版，亦實盼其能臻於至善。然而編輯史料類編，其用意正在於有益於使用者檢閱，編得好壞與否亦在於使用起來方不方便。就此而言，《明實錄類纂》的編輯出版，顯然在諸多方面存在許多缺失，使用時亦令人不敢放心，實不得不指出，俾利用者有所瞭解，於使用上不致輕忽，逕為引用，發生錯誤；亦且有助於後續各類卷的出版免生錯誤。當然，編纂者與使用者難免有心態上的差別，本文也許是使用者的苛求，也許是使用者的期盼，但不論如何，使用此一套書，是需要有心理準備，不要把它當做是完整性的資料彙編，利用時也最好再對照原書及校勘記。

□淡江大學歷史系講師·邱仲麟□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中琉關係檔案選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4月，及俞玉儲〈清代中國和琉球貿易初論〉，載《第一屆琉球·中國交涉史研討會論文集》，沖繩縣立圖書館，1993年3月。

大半年前琉球大學的赤嶺守君就告訴我，他們和北京有關方面合作編刊中琉關係檔案。大約1993年11月前後，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研究室的謝必震教授郵贈《清代中琉關係檔案選編》（以下簡稱選編）一冊。封面上印著北京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書局出版，版權頁上印的是1993年4月第一版。內頁正面有「本書的整理、編纂和出版，承蒙日本沖繩文化基金會的資助，謹致感謝。」內頁反面載徐藝圃主編，徐恭生、秦國經副主編，謝必震等五人為編輯。足見合作是琉方出資，中方出文獻並負責編纂印刷等事。編例、目錄均用繁體字，典雅大方，引人喜愛。本年春間又收到台北的中琉文經協會轉來琉球沖繩縣圖書館惠贈該書一冊。

編例說，該書是據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的宮中硃批奏摺四百件，和軍機處錄副奏摺四百六十三件而成，起自乾隆12年（1747），迄於光緒24年（1898）。檔案文件編號以年號為單元，乾隆朝自1至204，嘉慶朝203件，